

# 近二十年中国古代瘟疫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吴博文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 我国瘟疫史研究跨入新阶段, 除就瘟疫本身进行讨论的研究范式, 还出现了以医学研究为基础结合社会学、地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理论知识对瘟疫同社会及环境系统关系进行考察的成果。分析近二十年来中国古代瘟疫史研究的相关成果可以发现, 虽然瘟疫史研究路径有所创新, 但依旧存在理论框架构建不足, 内史外史各行其道, 研究地域、时间、内容不平衡, 新史学方法运用不完全, 缺乏现实关怀等问题。但我国瘟疫史研究真正独立发展至今仅有不到百年的时间, 这些未知和缺憾也正是这门学科的内在魅力与未来值得探索的前进方向。

**关键词:** 中国古代; 医学史; 瘟疫史; 综述

**中图分类号:** D929; R-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20) 05-0034-11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0.05.006

##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Pestilence History in Ancient China in Recent 20 Years

WU Bowen

(Institute of Southwest Environmental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pestilence in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phase. In addition to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pestilence, there are also results based on medical research that are combined with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volving sociology, geography, psychology, computer science, and other disciplines, i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examined between pestilence and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pestilence in ancient China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it can be found that although it has blazed new trails to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pestilenc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nadequat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ternal and external histories going their own way, imbalance in research area, time and content, incomplete application of new historical methods and lack of realistic pondering. However,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pestilence in China has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for almost a century, and it is these unknowns and imperfections that are the intrinsic charm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worth exploring.

**Key words:** ancient China; medical history; pestilence history; research review

在中国, 医学史是一个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其古老在于传统医学留下了大量医学典籍, 这些典籍大都建立在梳理、继承前人的医学观念之上, 进而自发形成了中国医学史研究的雏形; 其年轻又在于清朝后期现代医学传入, 传统医学观受到外来医学观念的冲击, 医学史逐渐呈现当代特质进入自觉时

代。20 世纪 30 年代成书的《中国医学史》<sup>[1]</sup>是中国医学史独立发展的标志, 该书对中国医学发展史做出系统总结, 为该学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台湾学者杜正胜提出新社会史的口号并与医学史研究结合组建“疾病、医疗与文化”研究小组, 医疗社会史浮出水面<sup>①</sup>, 史学界逐

收稿日期: 2020-09-18

基金项目: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2020 年度民族文化“百项精品”工程“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

作者简介: 吴博文 (1996—), 男, 河南邓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环境史、灾害史、体育史研究。

①杜正胜 1995 年发表在《新史学》上的《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是“医疗社会史”概念发展中的一大标志性事件。

步参与医学史研究。同时带有地学背景的学者龚胜生、梅莉、晏昌贵等人也开始关注瘟疫史研究，提出“环境疾病”<sup>[2]</sup>的说法。自此，医学史分类越来越细，涉及疾病的研究受到学界较高关注。目前，学界可见的相关综述主要有从中医医史角度撰写的《近50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sup>[3]</sup>、从史学研究出发着重述评的《中国史学界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sup>[4]</sup>、《中国疾病史研究刍议》<sup>[5]</sup>、着重回顾的《21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关于疾病史研究综述》<sup>[6]</sup>、以及断代疾病史综述《近20年隋唐疾病问题研究综述》<sup>[7]</sup>、《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述评》<sup>[8]</sup>等。针对近20年来中国古代瘟疫史研究，还未有学者进行系统回顾。本文以该时段瘟疫史研究的发展情况为基础，根据历史时期医学发展状况和民众对医学的认知情况将中国古代的时间下限定于1911年帝制覆灭上限延伸至史前，将近20年该时段瘟疫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归纳梳理，分七类进行回顾，最后就当前研究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展望。由于当前相关研究成果十分广泛，对部分成果分类可能存在交叉，限于个人能力也难免有所遗漏，若有不妥之处，望各家多多批评指正。

## 一、中国古代瘟疫史的理论探讨

中国医学史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理论探讨也较少，目前涉及较多的是有关医学史学科属性及“瘟疫”概念范围特点等内容的分析。

### （一）学科属性的理论探讨

一直以来医学界都是医学史研究的主力军尤以中医医史文献领域内的学者为众。直到20世纪70年代，史学界才逐渐向医学史投以目光。因此针对医学史的学科属性，许多学者持有将医学界和史学界的研究划分为“内史”与“外史”的看法。“由医学专业工作者所进行的纯粹科学技术史研究，通常被人称为‘内史’；而由历史学界进行的与专业技术有关的社会史研究，则被人称为‘外史’”。<sup>[9]</sup>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史学界先后提出“医疗社会史”及“环境疾病”的概念，“内史”与“外史”的边界在史学界新理论之下变得越来越明确。从此，史学界与医学界间几乎达成默契，沿各自的研

究路径渐行渐远。诚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而言，方向和门类迈向精细化无疑是其进步的重要标志。但医学史更像是一门包罗万象的交叉学科，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内部各相关要素组成的一个系统。特别是在医学史研究中以疾病尤其是瘟疫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往往表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把医学史用“内史”和“外史”两种路径进行区分并做主题研究对于中国医学史乃至古代瘟疫史的长远发展反而不利。这种理论导向也是当前瘟疫史研究出现困境的一大原因。

### （二）瘟疫史的名实之辩

关于“瘟疫”的说法有很多，大体可分为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两种表述系统，尽管表述各异，但范围多有重叠。2000年前后日本医史学界重要的学术期刊《日本医史学杂志》就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刊登了相关文章。邵沛在《日中疫病史の中の「疫」と「瘟」》<sup>[10]</sup>中从中国最古老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素问》及日本的《古事记》进行考察，分析了“疫”和“瘟”在中日文献中的源流，其认为“疫”源于中国军队的传染病，日本则指死亡人数甚众的疾病，而“瘟”则与温病相关。其后，邵沛在《中日疫病史における伝染説提唱の先覚者一呉有性と橋本伯寿》<sup>[11]</sup>中对先世疫病史研究者进行考证时，使用了“传染病”这一名词对传统医学中的疫病进行概括。国内学者李玉偿（尚）在其博士论文《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中对相关概念进行系统分析回顾后也选择采用现代医学概念进行归纳，其采用了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国际疾病分类，即ICD（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第9版（ICD-9）所指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并将ICD-9中的寄生虫病也纳入其中<sup>[12]</sup>。而中医医史学界由于研究依据的典籍成书较早及传统医学的特点，多选用传统医学的概念。张志斌的《疫病含义与范围考》是这一阶段从中医角度对其讨论的代表，其通过考证“疫”字的字源和最早记载相关内容的几本典籍指出“疫病是指具有传染或流行特征而且伤亡较严重的一类疾病。包括的病种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多种传染病，也可能包括某些非传染性流行病。”<sup>[13]</sup>对于现代医

学同传统医学间的差异,他认为“要追究以上所言疫病范畴中都具体包括了现代医学中的哪些传染病,则很难一一对号入座。”<sup>[13]</sup>另外,研究中使用明末吴又可可在《温疫论》中所讲“温病”<sup>①</sup>说法的学者也有不少。但温病是以温邪引起以发热为主症的疾病,所包含的范围较大,寒疫、湿疫又不在其中,这一概念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赖文等人则借鉴《中医大辞典》中的说法将瘟疫定义为“具有剧烈流行性、传染性的急性疾病。”<sup>[14]</sup>这种理论应该说是对上述情况进行回应的一种折中定义方法。

事实上,传统与现代医学概念很难等同。现代医学中内涵与瘟疫有密切联系的概念即传染病,这类病“由病原体引起,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病原体种类繁多细菌、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支原体、螺旋体、真菌、原虫和蠕虫等”<sup>[15]</sup>均属于病原体。但传统医学中内涵相关的概念则有温病、瘟疫、瘟疫等。温病包括一切具有温热性质的外感疾病,“既包括具有强烈传染性和流行性的一类温病,也包括传染性、流行性较小及少数不具传染性的温病。瘟疫则是指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和流行性的一类,所以瘟疫属于温病范围。”<sup>[16]</sup>瘟疫与瘟疫间的差别则在于瘟疫还有寒疫、湿疫等其他分类。应该说,瘟疫的概念包含了瘟疫的全部。瘟疫的核心要素是强烈的流行性和传染性,因此一些寄生虫病也能纳入其中。另外“疫情”也是学术界使用较多的概念,这是一个范围概念,只有形成大量病人感染才能称为疫情。通过上述分析及当前研究状况,显然,我们无法达成绝对明确的概念,但使用“瘟疫”一词进行概括,与现代医学的“传染病”比照或许比其他提法更恰当一些。

## 二、中国古代瘟疫史史料学研究

“研究历史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正确的理论,一是足够的史料……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sup>[17]</sup>中国古代瘟疫史作为中国史的分支,瘟疫史史料研究非常必要。史料研究在医史学界一直具

有很高的关注度。这一阶段从事相关研究的主要有广州中医药大学赖文和福建中医药大学林楠分别带领的两大团队。

较早从事瘟疫史史料学研究的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赖文团队,其申报了广东中医药管理局资助课题“岭南古代疫病史研究”,在岭南瘟疫史料整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其中,赖文同李永宸共同撰写的《古代疫情资料整理方法初探》“以岭南古代疫情资料为例,从疫情资料的界定、相关因素的筛选、疫情时间、地点、烈度确定等方面探讨以流行病学方法指导整理古代疫情资料”。<sup>[14]</sup>在瘟疫相关史料的录入筛选原则上其提出“疫情资料应当来源于纪实性文献,如史书、地方志、官府文牒、报刊、杂记、碑刻、宗谱、书信、传记等;疫情记录必须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否则不列入疫情统计,只保留在‘原始资料汇编’中;瘟疫病的散发病例不列入疫情统计,但将其保存在‘原始资料汇编’中,以备存查……参考流行病学的一般统计方法,把一个县一年内因同一瘟疫病种而死的人数在个位数、或发病人数在20人以下者,定为‘散发病例’。”<sup>[14]</sup>这一理论区别于帝制时期中医医史文献整理的方法,也开创了中医医史文献数据化整理的新路子。

福建中医药大学林楠团队的瘟疫史料整理立足福建并兼及周边地区。这些成果有长时段小区域的《福州古代疫病文献资料研究》<sup>[18]</sup>,有短时段大区域的《福建清代疫情资料分析及研究》<sup>[19]</sup>、《明清闽北疫情资料整理与研究》<sup>[20]</sup>,以及短时段聚焦治疗方法的《明清疫病文献针灸防治资料整理与研究》<sup>[21]</sup>等。这些成果大多从“正史、福建通志、府志、福州历代所辖县区以及部分外周县份的县志、笔记、文集、医书、期刊、资料汇编等”<sup>[18]</sup>提取瘟疫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林楠团队并不拘泥于传统医学文献,对史学文献也投以关注,成果也非罗列材料或就史料谈史料,而是在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后,对瘟疫发生的原因也做探讨,并注意社会、环境两大因素,是“内史”学界较大的突破。

<sup>①</sup>温病指的是感受温邪所引起的一类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又称温热病。属广义伤寒范畴。以发热、热象偏盛(舌象、脉象、便溺等热的征象)、易化燥伤阴为临床主要表现。

除上述团队研究，天津中医药大学王玉兴所整理的从春秋战国到中华民国成立前的“中国古代疫情年表”<sup>①</sup>也是医史学界较重要的成果。该年表将正史及部分医学典籍中有关疫情时间、地点的史料辑录出来以时间顺序进行排布，是目前可见具有通史性质且较详细的古代疫情年表。虽然该年表对史学与医学文献均有关照，但实录、报刊、档案资料均未能参照实为一大遗憾。

总体看，医史学尤其是医史文献领域学者是瘟疫史史料学研究的主力。因此传世医学文献是该阶段史料整理的重点，并兼及正史、地方志为代表的史学文献，但缺乏对实录、档案、报刊等文献的关照。可见，中国古代瘟疫史史料学既有传统史料学特点，又有其自身源于交叉学科的独特性，目前依旧处于起步阶段。

### 三、中国古代瘟疫史的长时段研究

以长时段<sup>②</sup>对某具体史学问题进行研究能更好地把握研究主体脉络和演进关系进而发现掩藏在表面史实下的历史潜流。在近二十年瘟疫史的长时段研究中，既有对某一地区古代疫情的宏观研究，也有聚焦于具体医学防疫方法、思想、机制的研究。

#### （一）大区域综合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赖文团队的《岭南瘟疫史》<sup>[22]</sup>是综合研究的代表。该书从岭南瘟疫资料整理，天花、霍乱、鼠疫等瘟疫的流行病学分析，疫情发生发展的社会、自然等因素及岭南人民对瘟疫的应对和瘟疫对社会的冲击进行研究。既有医史学的研究特点，又将相关社会因素纳入考量范围。不仅是当前岭南瘟疫史研究的代表作，也是近二十年来长时段大区域综合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李永宸、赖文的另一研究《岭南地区1911年以前瘟疫流行的特点》则总结了岭南瘟疫发生的规律，其认为岭南瘟疫多“集中在清代光绪、宣统年间；主要发生于春夏两季；疫情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疫种以鼠

疫、霍乱、天花为主；疫情总体与旱、饥、兵灾关系最密切；鼠疫与地震、霍乱与旱灾的伴发次数较高。”<sup>[23]</sup>赖文团队还对医史学视域下区域瘟疫史研究的思路做出总结，《四川古代疫情研究》是其中代表。这类研究多从数据提取、分析和展望三方面对某区域疫情进行流行病学考察。专注医学考察，忽略社会、环境等因素是该阶段瘟疫史研究的特点。随前文所述《岭南瘟疫史》的出版，这种研究思路有所完善，研究开始关注到社会、环境等因素。

吴娅娜的《湖湘疫病史研究》<sup>[24]</sup>是医史学研究范式完善的代表，该文除流行病学考察外，对湖湘官方、民间对瘟疫的应对都进行了分析，其重点回顾了传统医学对疫病的认识和治疗。最重要的是，其立足湖湘地区特点对巫医文化进行论述，是该文的最大亮点。其后还有王晓琳的《陕西古代疫情研究》<sup>[25]</sup>、李峰的《山西古代疫情研究》<sup>[26]</sup>，二文研究逻辑类似，均从某区域先秦瘟疫情况梳理至中华民国成立前后，对疫情发生的时代、季节、地理等特点进行分析，并将人口、战争、灾害等诸多因素对疫情出现的影响及政府抗疫做出考察。运用统计学方法和考察灾害与疫情的关系是这两篇文章的亮点。值得一提的还有杨青海和宝音图撰写的《古代蒙古地区疫病史考》<sup>[27]</sup>，这篇文章除研究区域鲜有前人涉猎外，其研究主题是蒙医学在瘟疫应对上的作用，这对民族地区瘟疫史的研究实践起到了开拓作用。

#### （二）瘟疫对策及文化史研究

瘟疫在具体内容层面的研究可分为对策和文化史研究两类。邓铁涛主编的《中国防疫史》<sup>[28]</sup>是目前瘟疫对策研究中里程碑式的成果。该书从先秦防疫梳理至当代抗击SARS，按防疫政策特点做针对性评述。最难能可贵的是其在论述先秦防疫时借鉴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论及秦汉防疫时又注意挖掘出土医简，这是

①年表以《中国古代疫情年表（一）（公元前674年至公元1911年）》和《中国古代疫情年表（二）（公元前674年至公元1911年）》为题分两部分发表在《天津中医学院学报》2003年的第3期和第4期。

②此处所指“长时段”研究多为以整个中国古代作为研究时段的成果，但涉及文化史的部分为保证成果的代表性一些以某一朝代、某一时期为研究时段的成果也纳入其中做梳理比较。

瘟疫史研究的一大创新和突破。王玉德的《试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从政府、民间和医家三方面对中国古代瘟疫对策进行梳理,其认为历代政府对防疫都较为重视,在医学上“以医师为主体对付各种疾病和疫情,有从上到下的庞大医疗网络、隔离疫病的场所、种痘防疫的举措。”民间“经常用烟熏火烧等方式防疫。为了对付疫疾,先民有送瘟神的风俗。民间曾用道术逐疫。每有疫情,民间就要大张旗鼓的做卫生。”<sup>[29]</sup>王文远的《古代中国防疫思想与方法及其现代应用研究》<sup>[30]</sup>从中医学角度对古代防疫方法进行分析,理论性较强。其论述了先民对瘟疫特点、病因的认识及瘟疫发生的其他相关因素的理解。文章第二部分对中医在瘟疫发生前、发生时及发生后的医学应对方法和时人对此法的理解做了具体分析,是前人研究中未曾详细涉及的。另外,该研究也具有现实关怀,对传统医学方法在非典型性肺炎、禽流感和甲型H1N1流感中的应用也提出其看法。近年来,瘟疫防治研究成为热门。张艺萍和沈玮玮所撰《古代中国依法防控疫情之道》从法律史角度对中国古代防控疫情做出解读,其认为“依法防疫制度举措的基本思路中及时获悉疫情并迅速确诊是抗疫的前提。强调个人卫生、整治环境,采取减免赋税、祭祀祈福等”是重要举措,同时“加入市场和科技带来的防控新法”最终形成“政府干预和市场调配协调抗疫的体系”<sup>[31]</sup>。王星光<sup>[32]</sup>则借助当前学术动态按照时间线索对先民应对瘟疫的情况作简单梳理,为大家展现出延续发展的防疫脉络。

在瘟疫思想史方面,除前文所述王文远的《古代中国防疫思想与方法及其现代应用研究》较大篇幅论及防疫思想史外,董维的《中国古代卫生防疫思想变迁的研究》是防疫思想史研究的代表。其认为“疫病认识是由最初的鬼邪致疫,逐渐发展为‘四时’‘六淫’致疫,到病原学思想‘戾气说’”的过程,“随着认识的提高形成了中国传统医学特有的防疫思想”。同时,其认为“防疫思想的变迁也与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密不可分,特别是与人类生活存在极其密切关系的政治、经济、科技水平、意识形态等因素会起到很强的能

动效应作用。”<sup>[33]</sup>

长时段瘟疫文化史研究是目前使用史料种类最丰富的研究方向之一,部分成果研究时段尽管不及前文以整个古代进行阐释,但也基于某一特定时期进行脉络分析。日本学界的伊藤清司早在1970年就在其文《古代中国の民間医療(三)》<sup>[34]</sup>使用了中国上古文献《山海经》进行瘟疫文化史研究。到了世纪之交,和田裕一的《中国古代における一般的医学観について》利用小说《三国演义》及经学《论语》《韩非子》等对中国古代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瘟疫文化观进行阐释。小高修司在2004年发表的《蘇軾(東坡居士)を通して宋代の医学・養生を考える:古代の気候・疫病史を踏まえて『傷寒論』の校訂を考える》<sup>[35]</sup>是该阶段日本学界对中国瘟疫文化史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作品之一。该文结合传世医学文献《伤寒论》、正史、诗词等内容以苏东坡为切入点思考宋代医学养生。其中包含对气候、道术与温疫、寒疫关系的分析,及时人的医学养生认识。该成果不仅在于史料多样、思路新颖,更在于其对瘟疫内涵的解读。日本学界对新材料的使用不仅是对中国瘟疫史研究的创新,也是对今后我们从事相关研究的启发。这一时期中国学界瘟疫文化史研究的材料也呈现了多元化特征,如小说、宗教典籍、墓志均纳入材料凭借。张蕊蕊的《浅析明清小说中的瘟疫描写》<sup>[36]</sup>利用明清小说对瘟疫的描写进行文学批评研究。马芸的《医治与神治——道教传染病治疗研究》<sup>[37]</sup>利用《道藏》对道教应对疫病及道教瘟疫文化进行梳理。张梦莹在《唐长安地区疾病史初探——以长安墓志为中心》<sup>[38]</sup>一文中利用墓志内容对长安地区瘟疫发生和社会情况进行研究,从瘟疫史角度开辟了墓志利用的新视角。

从宏观上看,瘟疫史研究基本脉络已比较清晰,只是尚为雏形有待进一步完善。从地域上看,南方研究显著多于北方。从内容上看,医疗社会史视域下的对策研究已比较深入,医史学更是如此,但防疫思想史研究较薄弱,心理史学等方法还未见明确引入,这也应成为未来相关研究发展的方向。

#### 四、断代瘟疫史研究

断代瘟疫史研究相比长时段研究更易把控,是

瘟疫史成果相对丰富的部分，出现了运用新史学方法从环境史、心理史、计量史学等方向进行思考的案例<sup>①</sup>。这类研究的时段集中于明清，其次是唐五代时期。

#### （一）地学与医学界对断代瘟疫史研究的关注

在医史界断代瘟疫史已不是一枝独秀，而是多学科研究者百花齐放，尤其是具备理科特别是地学研究背景的学者。这些学者在选题角度、论证逻辑上多与一般学者侧重不同，其更关注气候、人口、环境等地学因素对瘟疫发生发展的影响，梅莉、晏昌贵是其中的代表。二人合撰的《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认为明代传染病的地理分布情况是“南方明显多于北方。南方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及福建省。”以及“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原因，除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外，很大程度上与南方山地开发、流民移动方向息息相关。”<sup>[39]</sup>医史学界继续沿袭流行病学分析兼及社会变迁的思路进行，曾毅凌的《明清闽南疫病流行状况研究》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篇。该文“对明清闽南疫情文献资料作系统全面的调查与整理分析，结合疫病种类及时空分布、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探讨明清闽南疫病流行的特点和规律。并对明清闽南地区的瘟疫防治情况进行分析”，进而发现瘟疫“清代较明代频繁，疫病流行时间多发生于夏季，漳、泉、厦三地流行次数分布较平均疫病种类多，其中以鼠疫发生频次最多，自然灾害及社会事件可以引发或加重疫病流行。”<sup>[40]</sup>

#### （二）史学界对医疗社会史的关注

这一阶段医疗社会史的概念渐趋完善，史学界出现了一批从医疗社会史出发进行瘟疫史研究的结果，首推南开大学余新忠的研究。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sup>[41]</sup>一书从医疗社会史重构了清代的社会变迁情况，将医学现代化与中国的近代化主题联系，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获得极高地提升。该书不仅借鉴了传统医学关于瘟疫的概念也兼顾到现代医学的相关概

念，在第四、五章中对二者关系也做出阐释。这一重量级研究掀起史学界关注医疗社会史的小高潮，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有《唐五代瘟疫与社会研究》，该文通过“考察唐、五代时期瘟疫流行情况，运用医学、社会学、环境卫生学、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唐、五代时期的瘟疫与社会的关系，探讨瘟疫频发的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因素……进而揭示瘟疫在这一时期社会发展变迁中所担任角色。”<sup>[42]</sup>此外，还有通过瘟疫资料整理和社会史分析探讨“瘟疫与社会变迁”的《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sup>[43]</sup>，以及着重论述疫情应对的《唐代疫灾防治研究》<sup>[44]</sup>、《明代湖南疫灾防治研究》<sup>[45]</sup>、《唐代疫疾流行与社会主要应对机制研究》<sup>[46]</sup>，等等。

### 五、基于特定内容开展的中国古代瘟疫史研究

瘟疫在社会运转中并非独立单元，其往往作为社会要素与其他要素相互作用进而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动。针对这一特点，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会着重对某一特定内容深入剖析，史学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突出。

#### （一）关注特殊病种

瘴病在文献中时有出现，但什么是瘴病、瘴病怎么产生等在文献中却非常模糊。早在1991年龚胜生就关注到瘴病这一研究主题，并以《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sup>[47]</sup>为题对2000年以来瘴病的流行情况及分布变迁作出考证，确定瘴病与疟疾有关。后来，梅莉、晏昌贵和龚胜生共同撰写了《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三位均为较早关注瘴病的一批学者，经三人考证进一步肯定瘴病是指“具有传染性的流行性疾病——恶性疟疾”<sup>[2]</sup>，并从地理分布和经济开发两方面对瘴病做了细致分析。尤其是从瘴病流行区移民和土地开发角度来思考瘴病变迁使该研究的深度大大推进，这也是瘟疫史研究中极具新意的创举。而后，李玉尚与杨雨茜从明清美洲作物传入这一历史过程出发，在《番薯、玉米与清初以来四川的钩虫

<sup>①</sup>由于后文第七部分中会对瘟疫史研究中涉及环境史、计量史学的新动向进行详细论述，因此涉及这些方面的断代瘟疫史研究在本节不予赘述。

病》<sup>[48]</sup>一文中从耕作技术、肥料使用、作物推广等方面结合流行病调查阐述了四川地区钩虫病高发的原因。其从外来物种带来的生态影响进行瘟疫相关研究,是对研究视角的一大创新。

## (二) 关注动物瘟疫

目前学界对瘟疫史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人类易感疾病,动物瘟疫中以鼠疫<sup>①</sup>关注度最高,将动物瘟疫真正分离出来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宏观研究的较少,对人畜共患及动物瘟疫关注度不够。尹美霖是较早关注到动物瘟疫并从宏观角度进行研究的一位学者。其在《宋代动物灾害》<sup>[49]</sup>中对动物瘟疫的发生、发展和应对做了细致研究。在“环境致灾观”一节对当时的牛疫进行梳理,并探讨了旱灾和牛疫间的关系。孙烨在《宋代军医研究》中也对牲畜瘟疫有所论及,其通过对宋代军队兽医的培养、组织及治疗机制研究后发现“宋代牲畜疫病较多”这一因素“推进了兽医技术的进步。”<sup>[50]</sup>任兆杰则从文化史角度发现人、牛、疫间的微妙关系。魏晋以来“中国古代出现许多杀牛吃牛者遭疫病、得恶报,不杀不吃者可免疫、得善报的记载,开始形成赓续不绝的‘牛戒’传统。”<sup>[51]</sup>在其所撰《不食牛肉,家无疫患——中国古代“牛戒”故事研究》中,他认为“牛戒”源于瘟疫流行,“体现了地方社会与官府法令的博弈,而且一定程度上还反证宋代以来养殖业和屠宰业的发展。在牛戒观念影响下,‘屠夫’在古代社会中的形象也从‘屠牛酤酒’的姜尚和庄子笔下‘庖丁解牛’等治国之才的形象,逐渐沦为文人眼里的‘无赖’‘奸民’等”<sup>[51]</sup>以瘟疫故事作为切入对当时文化观念进行研究,无疑是瘟疫文化史的一大突破。

## 六、中医科技史研究

中医科技史是瘟疫史中最专业的领域,对针灸、配伍、汗法等进行研究需要建立在扎实的中医知识基础上,研究者以中医学界为众。

### (一) 传统医学抗疫治疗方法研究

陈玫芬的《疫病之中医预防研究》<sup>[52]</sup>是中医

抗疫方法研究中的代表作。该文在对中西医瘟疫相关基础理论及中国古代疫情状况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了瘟疫发生的病因与病机,并从治未病中“未病”“即病”和“瘥后”三阶段来介绍中医学对瘟疫的预防。第五章也着重对中医瘟疫预防方法进行了概述。尹高云的《中医汗法治疗疫病的文献研究》立足中医医史文献“对中医汗法治疗传染病的古代文献整理归纳。总结中医学自秦汉至明清关于疫病认识方面的文献。探讨中医学对疫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及历代医家汗法特点,以张仲景《伤寒论》及明清时期著名医家吴又可《温疫论》等为主要线索分析研究,探讨中医学采用汗法治疗疫病的普遍规律及应用方法。”<sup>[53]</sup>该文的一大价值是对张仲景《伤寒论》的探讨。前人研究多集中于强传染性与高致死率的瘟疫,对《伤寒论》中所涉及的传染性强但致死率低的病种关注较少,该文是对这类瘟疫研究的一大补充。

### (二) 中药抗疫方剂学研究

除中医抗疫方法研究外,中药药理学及配伍方法研究也是中医科技史中较受关注的部分。这类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借助统计学及算法对数据精确分析,其可靠性大大提高。蔡婉婷等人通过分析发现“古现代中医虽疾病名称相同,但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古代中医的疾病概念往往大于现代。古代痢疾用药多立足于清热,行气止痛;霍乱用药多立足于温补脾肾。现代细菌性痢疾用药多立足于清热泻火;霍乱多立足于清热解毒。霍乱的治疗古今是有明显差异的。”<sup>[54]</sup>黎征晖等人“以70多个古代瘟疫方剂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两种算法分别挖掘出19、17种核心药物,对结果进行分析对比,最终确定对抗瘟疫的15种核心药物。综合分析表明15种核心药物对治疗瘟疫疗效确切。”<sup>[55]</sup>张稚鲲、王若尧和陈仁寿“在收集整理古今肺系疫病临床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数据挖掘方法了解古今疫病组方特点。发现古今肺系疫病组方用药有相似之处,均以清热药使用最多,并常配伍解表药、化痰药、理气药、泻下药、活血药、止血药、补气药等。提示高热、疫毒瘀滞、痰凝气阻、血瘀血滞、迫血妄行、

①如后文提及刘雪松的《清代云南鼠疫的环境史研究》,在此对鼠疫不作过多赘述。



耗气伤阴等在肺系疫病中最为普遍，但古代方辛散之药更为多用，散邪治疫特点突出，而现代方清热药使用最多，更侧重清泻热邪。”<sup>[56]</sup>确定文献所载病种一直是疾病史研究的一大难点。中药学研究表面与史学关联度不高，但从侧面看对突破病种确定的困境或许能起到一定作用，对了解古代瘟疫防治进展也有较大意义。

## 七、瘟疫史新动向——环境疾病史与计量疾病史研究

20世纪史学界最引人注目的进展就是新史学的涌动，产生了心理史、社会家庭史、环境史、计量史学等新的史学研究方向。中国医学史学科的形成发展也受到新史学潮流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方向就是环境疾病史和计量疾病史研究，虽然目前产出成果不多，但依旧能看到这两个领域未来的巨大潜力。

### （一）环境史、环境疾病史与瘟疫史研究

环境史视域下的瘟疫史研究目前已有不少成果产出。早在1995年曹树基就发表了《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sup>[57]</sup>一文，其已经开始思考环境与传染性疾病间的关系。两年后，梅莉、晏昌贵和龚胜生三人的《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在开篇就提出“环境疾病”这一说法，他们认为“环境疾病是古今人类都必然面对的环境灾害之一，它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类群体的身心健康，而且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深层系统。探讨历史时期环境疾病的演变规律，不仅能揭示疾病对区域社会发展影响及区域社会对疾病的反馈机制，而且能为环境疾病防治和人口优生优育提供历史依据。”<sup>[2]</sup>因此，“环境疾病”这一小的研究方向正式登场。李玉偿（尚）2003年发表的《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在结论部分他写道：“在变化的环境中，病原体与人互动，呈现平衡与不平衡。表现在传染病的流行上，则有散发、暴发、流行与大流行……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卫生成为国家现代性的重要方面，环境、病原体与人的关系也因此达成新的平衡。尽管如此，由于人与微生物环境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而生态系统中某些毫不起眼的变化，往往对传染病的类型和特征产生很大的影响。”<sup>[12]</sup>

文中作者将人与各种病原体置于环境结构中考察并由此思考江南传染病史的流变，是对从资料整理到流行病学分析再到应对考察研究范式的突破。余新忠的大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也是如此，虽然环境因素不是其研究的重点，但其中涉及生态背景的问题也着墨不少。到了2011年，《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专题研究》<sup>[58]</sup>一书第二章“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专门就长江流域人类疾病分布进行梳理，可见，此时学界对环境史与疾病史研究的结合已相当重视。

刘雪松的《清代云南鼠疫的环境史研究》以环境史为视角对清代云南鼠疫进行系统研究，其认为清代云南鼠疫“影响了云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云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帮助鼠疫由疾病形态转变成环境灾害。由此，不难看出环境疾病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既彼此制约，又彼此推动的互动关系。”<sup>[59]</sup>王飞在《3—6世纪中国北方地区的疫病与社会》中也提出“就生态环境而言，由于森林等植被较前代受到较为明显的破坏，人口相对集中的关中及中原地区民众的生活环境有所恶化。特别是这一时期气候出现严重异常现象，北方地区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寒冷与高湿之中。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及生态背景下，北方地区频繁暴发大规模疫情，中国古代社会进入第一次疫情高峰期。”<sup>[60]</sup>其进一步得出生态环境变迁是导致疫情发生的主要因素。此外，金贤善的《明清两湖疫灾：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与社会应对》<sup>[61]</sup>和尹美霖的《宋代动物灾害》<sup>[49]</sup>对环境与瘟疫的关系亦有相关论述。

### （二）计量史学与瘟疫史研究

笔者目力所及从计量史学进行瘟疫研究的成果凤毛麟角。其一是丁慧芬等人所撰写的《华北地区古代疫情季节分布及相关因素分析》。该文“采用文献学和流行病学方法，建立华北地区古代疫情资料数据库。运用Epidata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双人录入），并通过逻辑比对进行查错。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计算各指标的构成比。”最终发现“清代疫情资料不仅数量最多，而且相关因素伴发比例也明显高于其他各组，



可能与清代社会文化发展进步,各地方志大量涌现及记述较为详尽有关。”<sup>[62]</sup>其二是刘迪等人所撰写的《基于 Spark 的因子分析法对古代疫病数据的分析与研究》,该文主要介绍分析模型的原理及实验处理优势。这一分析方法“利用 QR 分解法对因子分析法中相关系数矩阵进行分解,并使用 Spark 对分解矩阵进行分布式运算,再将计算结果进行胶合,从而提高大样本数据、高迭代次数下因子分析法的运行效率。”<sup>[63]</sup>虽然作者最后没有代入大量数据进行实验,但这一模型的提出给瘟疫研究开拓了计量分析的新思路。

## 八、中国古代瘟疫史的研究展望

中国医学史历经近百年发展,并已取得显著成就。瘟疫史作为其中的分支也是如此,从理论到实践均获得长足进步,但该分支目前仍处于初创阶段,有较多值得深入挖掘的领域。

第一,瘟疫史理论是研究突破的关键。纵观近二十年研究成果中的核心概念,有疫情、瘟疫、疫病、疫疾、传染病等,这些概念表面相似实则有不少差别。在分期问题上,尽管当前已有不少长时段研究,但分期大多从现代流行病学出发,而非从时人立场出发。目前研究似已进入瓶颈,如果不转向对前一阶段研究的总结反思,研究便难以突破当前的固定模式。

第二,内史与外史亟待深度融合。中国医学史研究长期遵循医学和其他学界两条不同路径进行研究,进而产生内外史之说。这种理论使得本来模糊的边界清晰起来,两种研究路径渐行渐远,导致综合性研究匮乏。医家不注重运用史学文献、借鉴史学成果,地学、史学等研究者对医学素养的提升也不够重视。笔者认为社会及环境系统应是统合整体,就医学论医学就历史论历史都是不可取的,交叉学科的发展道路才是瘟疫史研究深入发展的方向。

第三,地域、时间与研究内容的不平衡。开展瘟疫史研究较早的福建、岭南已从理论、史料、实践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而北方的研究大多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明清遗留史料较多,涉及明清的成果最为丰富,其次是隋唐瘟疫史,先秦瘟疫史的研究最为薄弱,考古报告中病理学材料鲜有人使用。此外,研究内容多以烈性瘟疫为主,对温和型瘟疫

的研究寥寥无几。并且藏医、蒙医、壮医学等民族医学在防治瘟疫中的研究中也很少有人涉及。这些地域、时间和内容的不平衡性也正是未来研究亟待填补的方向。

第四,史料运用单一与瘟疫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不足。目前,医史界学者在瘟疫史研究中依旧占据主导,文献凭借多为医史文献、正史和地方志。此类文献涉及民众及社会的材料较少,因此社会心理、文化史相关研究较薄弱。新史学强调泛史料化,日记、家谱、报刊、笔记小说、诗歌等均可作史料。这些材料能够反映多阶层对瘟疫的认知。运用新史料进行瘟疫思想文化史研究或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

第五,走出“假面新史学”。尽管环境疾病史、计量疾病史等提法已在学界浮现,但不乏空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研究。如社会心理史研究,能够见到的只是“社会心态”的总结,而非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环境疾病史研究亦是如此。“环境疾病”应是一体两面的专有名词,而非“环境”和“疾病”的叠加概念。瘟疫的发生、烈度、预防等均与环境密切相关,将瘟疫置于环境系统中考察才能真正体现出“环境疾病”的特点。

第六,发展大数据瘟疫史研究。当前医史文献领域专家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已取得很大成就。但涉及数据分析依旧采用的是传统统计学方法,套用 SPSS 等统计软件。这些方法虽然已非常成熟,但无法针对学科特点进行个性化分析。因此形成适合瘟疫史数据分析的数学模型将是在大数据背景下值得期待的一大研究点。

总之,中国古代瘟疫史在理论、史料整理、长时段瘟疫史、断代瘟疫史、中医科技史及新史学层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瘟疫史研究依旧处于起步阶段,值得各方学者继续深入耕耘。瘟疫史作为充满现实关怀的一门学问也势必与史学研究长期共存。进行瘟疫史研究也是提醒我们警钟长鸣,“因为危机始终存在,我们没有理由对于人类将来的历程持乐观的态度”。<sup>[12]</sup>

## 【参考文献】

[1] 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

- 社, 1984.
- [2] 梅莉, 晏昌贵, 龚胜生. 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7, 12 (2): 33-44.
- [3] 赖文, 李永宸, 张涛, 等. 近 50 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 [J]. 中华医史杂志, 2002, 32 (2): 108-113.
- [4] 王小军. 中国史学界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J]. 史学月刊, 2011 (8): 100-108.
- [5] 林富士. 中国疾病史研究刍议 [J]. 新华文摘, 2004 (6): 58-59.
- [6] 彭庆鸿. 21 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关于疾病史研究综述 [J].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 15 (1): 93-97.
- [7] 郑言午. 近 20 年隋唐疾病问题研究综述 [J].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9 (3): 29-36.
- [8] 余新忠, 陈思言. 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 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述评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56 (3): 111-128.
- [9] 曹树基, 李玉尚. 鼠疫: 战争与和平 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 (1230—1960 年) [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7.
- [10] 邵沛. 日中疫病史の中の「疫」と「瘟」[J]. 日本医史学雑誌, 2000, 46 (3): 440-441.
- [11] 邵沛. 中日疫病史における伝染説提唱の先覚者一具存性と橋本伯寿 [J]. 日本医史学雑誌, 2000, 47 (3): 604-605.
- [12] 李玉偿 (尚). 环境与人: 江南传染病史研究 (1820—1953) [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3.
- [13] 张志斌. 疫病含义与范围考 [J]. 中华医史杂志, 2003, 33 (3): 159.
- [14] 赖文, 李永宸. 古代疫情资料整理方法初探 [J]. 中华医史杂志, 2001, 31 (1): 27-30.
- [15] 聂刚基. 传染病学 [M]. 郑州: 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6.
- [16] 马健. 温病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 [17] 何忠礼.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18] 宿佩勇. 福州古代疫病文献资料研究 [D]. 福州: 福建中医学院, 2005.
- [19] 王志良. 福建清代疫情资料分析及研究 [D]. 福州: 福建中医学院, 2009.
- [20] 熊益亮. 明清闽北疫情资料整理与研究 [D]. 福州: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4.
- [21] 戴俊荣. 明清疫病文献针灸防治资料整理与研究 [D]. 福州: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5.
- [22] 赖文, 李永宸, 著.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编. 岭南瘟疫史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
- [23] 李永宸, 赖文. 岭南地区 1911 年以前瘟疫流行的特点 [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9, 16 (4): 321-325.
- [24] 吴娅娜. 湖湘疫病史研究 [D].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 2012.
- [25] 王晓琳. 陕西古代疫情研究 [D]. 西安: 陕西中医学院, 2013.
- [26] 李峰. 山西古代疫情研究 [D]. 太原: 山西中医学院, 2016.
- [27] 杨青海, 宝音图. 古代蒙古地区疫病史考 [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6 (2): 156-158.
- [28] 邓铁涛. 中国防疫史 [M]. 南宁: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 [29] 王玉德. 试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 [J]. 江汉论坛, 2003, (9): 87-91.
- [30] 王文远. 古代中国防疫思想与方法及其现代应用研究 [D]. 南京: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 [31] 张艺萍, 沈玮玮. 古代中国依法防控疫情之道 [N].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0-3-15 (7).
- [32] 王星光. 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N]. 河南日报, 2020-2-28 (9).
- [33] 董维. 中国古代卫生防疫思想变迁的研究 [D]. 哈尔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5.
- [34] 伊藤 清司. 古代中国の民間医療 (三) [J]. 史学, 1970, 42 (4): 41-62.
- [35] 小高修司. 蘇軾 (東坡居士) を通して宋代の医学・養生を考える: 古代の気候・疫病史を踏まえて『傷寒論』の校訂を考える [J]. 日本医史学雑誌, 2004, 50 (3): 349-370.
- [36] 张蕊蕊. 浅析明清小说中的瘟疫描写 [J]. 文教资料, 2017, (35): 98-99.
- [37] 马芸. 医治与神治一道教传染病治疗研究 [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7.
- [38] 张梦莹. 唐长安地区疾病史初探: 以长安墓志为中心 [J]. 中医药文化, 15 (1): 65-77.
- [39] 梅莉, 晏昌贵. 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 [J].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23 (5): 80-88.
- [40] 曾毅凌. 明清闽南疫病流行状况研究 [D]. 福州: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0.
- [41] 余新忠.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42] 李曼曼. 唐五代瘟疫与社会研究 [D].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 2006.

- [43] 陈旭. 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1.
- [44] 郑秋实. 唐代疫灾防治研究 [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 [45] 蒋明明. 明代湖南疫灾防治研究 [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5.
- [46] 高云波. 唐代疫疾流行与社会主要应对机制研究 [D].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19.
- [47] 龚胜生. 2000 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 [J]. 地理学报, 1993, 48 (4): 304-316.
- [48] 李玉尚, 杨雨茜. 番薯、玉米与清初以来四川的钩虫病 [J]. 科学与管理, 2013, 33 (6): 33-51.
- [49] 尹美霖. 宋代动物灾害 [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7.
- [50] 孙烨. 宋代军医研究 [D]. 开封: 河南大学, 2018.
- [51] 任兆杰. 不食牛肉, 家无疫患: 中国古代“牛戒”故事研究 [J]. 史林, 2019 (5): 37-48.
- [52] 陈玫芬. 疫病之中医预防研究 [D]. 南京: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 [53] 尹高云. 中医汗法治疗疫病的文献研究 [D].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2.
- [54] 蔡婉婷, 李新霞, 陈仁寿. 基于 Apriori 算法的古现代疫病用药比较与分析 [J]. 时珍国医国药, 2017, 28 (6): 1510-1512.
- [55] 黎钰晖, 郑晓梅, 刘迪. 古代疫病中方剂核心药物的发现算法比较 [J]. 智慧健康, 2018, (8): 27-30.
- [56] 张稚鲲, 王若尧, 陈仁寿. 古今肺系疫病方配伍特点对比研究 [J]. 中医药信息, 2018, 35 (4): 73-76.
- [57] 曹树基. 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 [G] //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历史地理: 第 12 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183-193.
- [58] 张建民, 鲁西奇, 主编. 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专题研究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 [59] 刘雪松. 清代云南鼠疫的环境史研究 [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1.
- [60] 王飞. 3—6 世纪中国北方地区的疫病与社会 [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1.
- [61] 金贤善. 明清两湖疫灾: 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与社会应对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 [62] 丁慧芬, 王秀莲, 李悦, 等. 华北地区古代疫情季节分布及相关因素分析 [J]. 中医研究, 2008, 21 (11): 61-63.
- [63] 刘迪, 郑晓梅, 黎钰晖. 基于 Spark 的因子分析法对古代疫病数据的分析与研究 [J]. 无线互联科技, 2018, 15 (13): 102-104.

